

# 門 卷

吳 蓉 胡洪涛 編著



# 斗 蟋

莫 容 胡洪涛 编著

## 内 容 简 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斗蟋的识别、捕捉、喂养、管理、调教、格斗、损伤等秘诀，以及我国有关蟋蟀专著的基本内容。书后有《促织经》史料汇编，分类详细。

本书行文流畅，情景交融，富有诗意。适于昆虫学工作者、民俗研究工作者、斗蟋爱好者阅读。

## 斗 蟋

熊 容 胡洪涛 编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10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科技新书目：203—100

ISBN 7-5023-0890-3/S·109

定价：3.40元

## 前 言

《促织经》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近几年来，笔者有幸浏览了自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十几种《促织经》，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有关史料，偶有所获，辄记点滴心得，集腋成裘。在友人们的催促、激励下，写成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倘能对广大昆虫学研究工作、民俗学研究工作者以及蟋蟀爱好者有所帮助，将是我们的欣慰。

我们希望能把这本书写得“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因而尝试着运用散文笔法，并对难念难懂的字句，作了简明的注释。历代《促织经》辗转抄印，鱼鲁豕亥，讹讹甚多。我们在点校、考释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行了分类筛选，除在文中略引外，并附以资料汇编，便于读者查考资料来源、研究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著名昆虫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吴褐楨和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管致和两位先生，曾给以热情鼓励和具体帮助；农业出版社、首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资料室提供了部分资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宁生、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周至宏、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邵伟以及山西马志华等同志，协助绘制、拍摄、提供精美的图片，《农民画报》编辑部孙宝麟同志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致谢忱。

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一九八九年春于北京

# 目 录

1. 千古奇书《促织经》 斗蟋秘诀传后世  
——《促织经》的产生和演变……………(1)
2. 悠悠往事八百载 源远流长话斗蟋  
——斗蟋的历史……………(9)
3. 踏破铁鞋寻故里 匠心巧运捉“将军”  
——蟋蟀的捕捉……………(16)
4. 形形色色各千秋 品头评足识优劣  
——蟋蟀优劣的识别……………(22)
5. 因虫喂食辨苍雏 荤素搭配养健蛩  
——蟋蟀的饲养……………(29)
6. 察时管理顺虫性 慎配三尾结良缘  
——蟋蟀的管理和调教……………(32)
7. 蟋蟀名号一百九 英雄座次费安排  
——蟋蟀名录……………(36)
8. 神秘鸣声远古传 喜怒哀乐秋声里  
——蟋蟀的鸣声……………(69)
9. 争雄恐负东君意 决胜宁辞一介身  
——蟋蟀的格斗……………(76)
10. 华佗自有回春术 恩主殷勤胜败时  
——伤病医治及斗后护理……………(85)
11. 《促织经》资料汇编……………(89)  
    (一) 名称……………(89)

|                        |       |
|------------------------|-------|
| (二) 生态环境、特性、特征、鸣声..... | (90)  |
| (三) 捕捉.....            | (95)  |
| (四) 调养、喂食.....         | (96)  |
| (五) 管理.....            | (98)  |
| (六) 形态综论 .....         | (105) |
| (七) 形态各论 .....         | (112) |
| (八) 论斗 .....           | (132) |
| 主要参考书目 .....           | (144) |
| 内容索引 .....             | (146) |

## 千古奇书《促织经》 斗蟋秘诀传后世

### ——《促织经》的产生和演变

蟋蟀，古称促织、𧈧孙、蛩（吟蛩、秋蛩）、寒虫等，俗称蛐蛐儿。有关蟋蟀的专著，通称为《促织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关于昆虫的专著，蚕有《蚕经》、《蚕书》等二十多种；蜜蜂有《蜂衙小记》一种，其他则不多见。但是蟋蟀，在这个占世界动物种类三分之二、为数上百万种的浩瀚的昆虫家族里，却倍受人们的青睐。自宋以来，形形色色的《促织经》不下十二种之多。

宋代贾似道（1213—1275）的《促织经》，在《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有记载，全书一卷，原书已难查找，今存本为明周履靖续增《促织经》二卷。周为明末农学家，浙江嘉兴人，著有《菊谱》，书中有较详细的菊花害虫防治法，还校正过《兰谱奥法·去除蛾虱法》，足见他对昆虫乃至害虫防除，都有一定的研究。由贾似道编辑、明代梅贻周履靖续增、金陵荆山书林梓行的《促织经》（图1，以下简称贾周本），全书约1.6万字，分论赋、看法、论形、论色、论养、论斗、论病等部分。论赋与看法为总论，其余五部分为分论。论形分述头、脸、项、翅、腿、肉的优劣，并根据十

八种蟋蟀的形态，作了比喻性的命名，如蝴蝶形、蜈蚣形等；论色实际为各种名色蟋蟀的介绍，提出色样有五等，并具体描述了它们（即“五绝”）的形态，分别论述了红、青、黄、黑、白、紫等六种真色（真红、真青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蟋蟀八十三种；论养有养法十二条，配合、禁忌、养胎、浴雌、三秋养法及各家养法；论斗有对比、防敌、六不斗法、八不斗法、审势、惜牙等斗法八条，以及比斗时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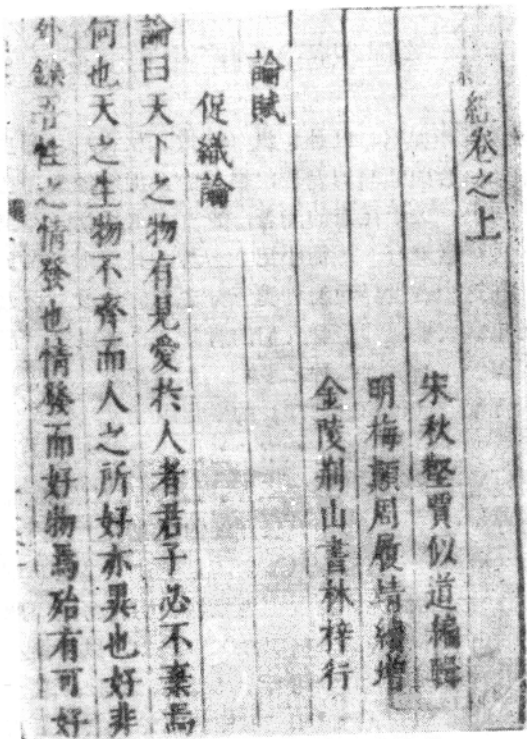


图 1 《促织经》书影（贾似道编辑，周履靖续增）



逗的具体手法；论病有“蚕有四病”、“治虫身热”、“医伤损方”，尚有配雌的方法。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蟋蟀专著，是前人探索蟋蟀世界奥秘成果的系统记载，条理分明，因此成为以后历代各种促织“经”、“谱”、“志”的祖本。在体例上，对后代的农书也有影响。近年来在河南发现的清代无名氏《鸡谱》，其编写体例与此十分近似。

明代袁宏道（1568—1610）《促织志》（下简称袁本）袁为明文学家，万历进士，著有《袁中郎全集》。在此书的“杂录”中有一百五六十余字的短文《畜促织》，考其内容与《促织志》同，唯“志”在每段前增有标题。内容多源于贾周本，但文中详载了当时京师斗蟋的盛况，并将“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的“青聒”和“京师人谓之金钟儿”的两种昆虫，与促织加以区别，这些无疑是对民俗学、昆虫分类学的贡献。

明代刘侗（1594—1637）《促织志》（以下简称刘本）。刘为明文学家，崇祯进士。曾与于奕正合撰《帝京景物略》，详记北京风物，颇有资料价值。此书中有胡家村（今北京永定门外）一则，言此处所产蟋蟀“殊胜他产”。并记载有捕蟋方法等，以上内容与其《促织志》相同。《促织志》全文约1700余字，分“产”、“捕”、“辨”、“材”、“养”、“斗”、“名”、“留”、“俗”、“别”等部分。“材”中将15种名号的蟋蟀分组、分等；养法中总结并增补了医病方法；“别”中较袁本更具体地描述了聒聒儿（蛐蛐儿）、金钟儿的形态与声音外，还对蝉、螳以及他认为的促织别种诸如油葫芦、椰子额、老米咀等的形、声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特别是“留”一则，详尽地阐明了“留其鸣深冬”的人工繁育技术。

清朱翠庭《蟋蟀谱》（以下简称朱本）。约一万八千字，现仅见手抄本。朱生卒年代不详，成书年代也有待考证。但从其载有康熙辛卯年（1711）事，可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清初；再从继朱序之后的“原序”分析，此序作者自言：

“读麻城刘同人（即刘侗）先生所著《帝京景物略》”，而不言读过成书于乾、康年代朱从延的《豳孙鉴》和金文锦的《促织谱》；可以推论，此时后两书尚未问世；朱本中也未找到参阅过金文锦的痕迹，由此更可以判断，朱本的成书年代在金文锦《促织谱》成书（即1715年）之前。此书对蟋蟀的形态、颜色、斗性，有不少新的论述。品格论中认为蛩分“六等”，对每一等的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论及颜色时，提出“蛩辨五色”和紫、青、黄、红、黑、白各色总诀。例如在青色总诀中说：“真青头要青金色，白麻路细丝贯顶，金箔明亮翅，肉白、牙白、腿白者为上，号白钳青”，“须知世上无斑腿、黄肉、黄线之青也”。可见，对各色蟋蟀的认识，已逐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高度。在此书的《见闻纪异》中，记述了紫、青、黄、红、黑、白等的各异色，以及头、斗线、眼、须、脸、钳、项、翅、肋、声、肉、脚、爪、尾、宿、食的各种形状、名称和情况。这种写法，为以后的石莲和李大猷所沿用。对蛩为什么生铃（注：一种病，如人体所生的瘤），失口昏伏的急救，对一些沿用已久的看法如“黑白全无用”、“青黄不可欺”等都有新的见解。此书所载蟋蟀名称近百种。

金文锦（字伊，同伊yī，金文锦即金文锦）《促织谱》。成书于1715年（简称金文锦本）。作者在自序中说：“至宋贾秋壑（即贾似道）著《促织经》，所谓形色，始详论焉。”“迨明季坊刻，多创为歌吟……，然错舛纰缪，正复不少”

“挑灯删定，非敢自附于古之格物君子”。此书收入《四生谱》（四生即画眉、黄头、促织、鹌鹑），约六千多字，有蟋蟀图八幅。文字简明，但内容未脱贾周本窠臼，唯结尾部分五百余字对头脑线、牙钳、颜色、形象（腿、项）等方面的论述，为旧论之所未及。至1919年，贾树模又重新校刊出版，并在序中说：“顾古书虽著，而传本绝少，有怀巨金谒书林数日弗遇一册者。”“乃重加校正，特刊专本。”可见到了民国初年，斗蟋之风犹盛。

朱从延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蛭孙鉴》（1776年）三卷。分前鉴、后鉴、续鉴，全书一百五十余页。此书内容系据贾周本，而有所整理与补充，对蟋蟀各品种的产地有较详细的记载，这对李大猷（chōng 读充）后来编辑《蟋蟀谱》时，能详细列出蟋蟀产地的三十个地名，也不无影响。

石莲《蟋蟀秘要》（以下简称石本）（1861年）。石莲历任工部员外郎，善诗文，著有《书春堂诗集》，“平生善相蟋，深得其精微秘旨。”（注：见石本福萱兴善跋）。“精于物理”，在他的“《书春堂诗集》内有《蟋蟀秘要》一本，言蟋蟀上、中、下等品类，可为人指南”（注：见同本吴补功文）。由此可见，石莲在当时就因其诗文和善相蟋蟀，而享有盛名。他所撰的此书，多有创见。以“五色全名”为题，列举蟋蟀品名，青色十四种，黄色九种，红色四种，白色七种，黑色三种；“虫身全名”中分别将身体各部位的形状、名称等作了描绘，这是对朱本的继承与发展。还首次提出“八样上品变化”“辨斗”（注：视虫配雌情况而判断比斗的胜负）、食疗药方“大力散方”等等。其中“蟋蟀大全”一则对黄、红、紫、黑、青、淡黄、狗蝇黄、青翅

蓝项八种蟋蟀提出了牙、腿、肚、项等项的具体要求，书中记载着不少通过精细观察发现的宝贵经验。正如他在序中所说，这是一本“考古穷微”的书。全书一万六千字，石印本。

冰心垒主人宝藏《促织谱》。手抄本。未见作者，但序中说：“芸窗道人于中嵩书院。”估计作者为道士，其活动范围在今河南一带。序中还说：“近得促织旧本一帖，”

“遂复增己见、增己诗词若干，众梓以侵，用彰不朽”云云，看来，以后并未付印。全书六十六页，约一万三千字。除少数内容外，多沿用贾周本。简称芸本。

李大猷（石孙）纂辑《蟋蟀谱》。成书于1931年，全书四万多字，图九幅，十二卷。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卷首主要为杜甫、白居易、朱之蕃、张维及贾、周本所载的论赋乃至纪事等。卷一为盆考、用具、各种葭法（注：葭 jiā，音加，芦苇。在《促织经》中指苇草经蒸制后用以挑逗蟋蟀格斗的工具。后改用鼠须、猪鬃等物代替；葭法即为挑引蟋蟀的方法）。卷二为论说，收先天后天论、得时失时论、神相骨相肉相论等七篇。卷三为饲养，有新的填盆法和一些特殊的养法，以及伤病治法、浴法、选三尾法、三尾剪须去筋法等等。卷四为产蟋蟀地志及五色变虫论考。作者列举了七十种蟋蟀将军的产地三十处；经核对分布于今浙江、山东、河北、北京、江苏、安徽、上海、天津、湖南等省市。在“五色变虫论考”中，作者认为蟋蟀有的为“三尾所下之卵至次年即出，然亦有非卵出，而为他虫所变者”，这种“化生论”<sup>\*</sup>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其中列举

\* 化生论是中国古代的物种起源学说之一，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灭，互相转化。如在《礼记·月令》中，即有“腐草为萤”的记载。

的蜈蚣子、蜈蚣、蝴蝶等十五种“变虫”，分别有与它们相对应的昆虫相似的形态，其中还介绍了十四种被人们认定是善斗的蟋蟀。现代昆虫学家认为善斗的蟋蟀仅斗蟋(*Scapsipedus micado* Saussure)一种，那么，这些异态的蟋蟀，是否即其亚种？卷五为斗法。卷六为形体，包括头大说、头尖说及对虫体各部位的描述，在“声”一则中共记载有四十三种不同蟋蟀品种发出的鸣声。卷七主要为“促织上八格”标准，“颜色目别”、“辨色说”、“色名辨正”等。“颜色目别”中提到的青色有三十种，黄色有十九种、红色十六种、白色二十色、黑色十三种、紫色十七种，较之石本，不仅名色增加，在其后的“辨色说”中，还有较详细的分辨法。卷八至卷十为三秋异形和异名的超、上、中、次各品蟋蟀，共计有一百一十七种之多。此书兼收并蓄，内容虽较系统和完整，但违悖现代生物学观点之处甚多，如前述“化生论”以及“相虫取官府合格说”、“逐年应生虫色说”等。由于辗转抄印，文字上的讹误尤多，阅读困难。简称李本。

此外，清代昆虫学家方旭所撰的《虫荟》中也有关于蟋蟀的描述，并著有《促织谱》。农艺学家陈淏子在他的名著《花镜》中，也专设蟋蟀一则。文学家蒲松龄也在《聊斋志异》中留下了融合着丰富的斗蟋知识的名篇《促织》。

这些蟋蟀的“谱”、“志”、“经”，介绍了蟋蟀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品种、名号、形态特征、生活习性；总结了其饲养、管理、调教、比斗及人工繁育等方面的经验，记录着我国历史上一段长达一千多年间的民风民俗的一个侧面。今天，我们重新发掘、整理这些历史赐予我们的家珍，是否能对昆虫分类工作者，尤其对直翅目的研究工作者，有参考价值呢？例如从古人对蟋蟀地理分布的记载，对多达一

百九十种蟋蟀形态、行为乃至鸣声的描述，可以为昆虫分布、分类甚至新种的发现，提供线索；从对蟋蟀习性（如禁忌等）的记述可以为探求新的防治方法，提供新的思路；对民俗研究工作者，这一曾在历史上引起千万人激动的雅事，其源流，其盛况等，可以拓宽他们研究的素材；对广大斗蟋蟀爱好者，则可以广开眼界，得到许多历来在民间斗蟋者之间互相封锁，秘不传人的诀窍，以增加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的情趣。斗蟋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国家应予以正确的引导，组织蟋蟀比斗，供人欣赏。

## 悠悠往事八百载 源远流长话斗蟋

### ——斗蟋的历史

蟋蟀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唐风·蟋蟀》《豳风·七月》中都有蟋蟀，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开始人们只是欣赏它动人的鸣声。至唐代天宝年间，“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太液风寒，唐主赐金笼之宠；昭阳日曛，玉妃开小赌之筵”（石本序），可见，明皇的宫中，既听其声，又观其斗。其时，长安斗蟋成风，有人“饷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斗蟋之风，是否即始于此时呢？顾文荐又说：“其来远矣”，至于远到何时，却未详说。今天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之戏应早于开元天宝以前，是有其道理的，当时长安斗蟋之盛况，岂是短期之内可以发展、形成的吗？因此可以说，斗蟋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二百多年。

南宋，为斗蟋史上最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活动已不限于贵族，市民也雅爱此戏。《西湖老人繁胜录》（明永乐大典本，吴子修校勘）中，记载了当时的京都杭州斗蟋之风的

盛况：“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茗（茗）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文中还详述了蟋蟀笼式之多，有银丝笼、金漆笼、黑退光笼、瓦盆、竹笼、板笼或作楼台为笼。斗蟋之风乃至传至僧侣之中，相传济公和尚就曾畜过一头“一根须短，一根长”的蟋蟀，名唤王彦章，因善斗屡获全胜，又叫王铁枪（即白头青背，见后“蟋蟀名录”）蟋蟀死后，济颠为它写了《瘞促织鸛鹄天》、《把火文》、《撒骨文》，它们一直为贾周本等多种《促织经》收录。更为有趣的是，文中还说，当济颠将王铁枪的骨灰撒入荡漾着月光的碧波中时，一阵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合手当胸说：感谢我师点化，弟子已得超升。这神话，在古人的心目中，为蟋蟀这种灵物，更增添了神秘感，同时也反映出，古人对蟋蟀归宿的良好祝愿。人们活着时，爱蟋蟀，死后还抛不开，更有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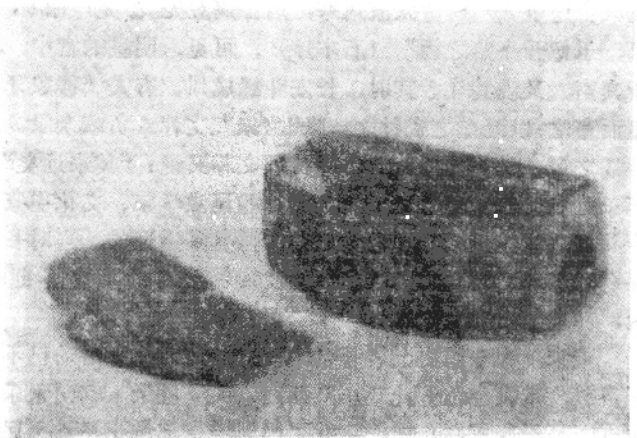


图2 南宋的蟋蟀过笼



将饲蟋用具作为随葬品，大概是想在天国中还要使用吧。1966年5月，镇江宋代古墓曾出土蟋蟀过笼三只（图2），正足以作为反映这一民俗的佐证。

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迄今，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还收藏着一幅有趣的中国画《儿童斗蟋图》，即



图3 (宋)儿童斗蟋图 (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收藏,马志华临摹)